



宁本君在文章《创刊之初话艰辛》中对《潍坊日报》创刊初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。1984年6月，他从诸城调来报社，任总编室主任。在创刊头一年，报社同志一日三餐“打游击”，调来的同志没有宿舍，只好在办公室楼上挤。为了解决同事们的吃饭问题，他到县市区求粮。

创刊之初困难重重

一日三餐“打游击” 到县市区求粮吃饭

时任《潍坊日报》总编室主任宁本君在《创刊之初话艰辛》中回忆，在创刊的头一年，报社同志一日三餐“打游击”。当时，在报社食堂就餐的仅有十几人，就一个炊事员。因伙食不好，大家有意见，一年换了三个炊事员。其实，这也不怪炊事员，是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就说早晨的稀饭，粮食部门不供应大小米，早餐煮玉米糊糊，大家喝几顿就够了，改做疙瘩汤成了浆糊，喝白开水又觉得清苦。再说午饭也难做，做多了剩下，做少了不够。面对这个情况，同志们吃饭经常换地方，有时到招待所吃，有时到小餐馆吃，有时到外单位食堂吃，花钱多吃不好，也只好将就着。

为了让同志们早餐喝上稀饭，宁本君到当时的诸城县粮食局求援。时任局长曾是他的老同事，说明来意，局长面露难色，说大米没有，小米也很少，看报社新建有困难和个人的面子，破例批给100公斤小米（要粮票）。从这以后，报社食堂每天早上有了小米粥，比一般单位食堂条件还优越，炊事员和同事们皆大欢喜。

吃饭困难，住宿更困难。各县调来的同志必须住报社，而报社连一间宿舍也没有，大家只好在办公楼上挤。到1985年8月，有8名副总编和部室主任的家属调来潍坊工作，随之家也搬来了，住哪里？女方单位没有宿舍，还得在办公楼上挤。于是一、二楼办公，三楼倒出8个单间做宿舍，不论人口多少，每家一间，洗漱间、厕所公用，男女老少，早早晚晚，其不方便可想而知。住就这样将就，吃饭则各家自炊。在走廊里，所住房间旁边，各安放一个液化气炉子，每到下班做饭，油盐酱醋五味俱全，锅碗瓢盆交响乐，邻里之间和睦相处。

就这样过了一年，到1986年7月，搬进报社新买的单元宿舍楼，报人们才真正有了家。



《潍坊日报》夜班编辑室。



《潍坊日报》装车发行。

人手少白黑干 一人身兼多职

报社创刊初期人手少，全报社业务和行政人员共28人。虽说后来陆续增员，但总是人手不够用。宁本君说，从出报纸创刊号起，他在总编室工作了3年，工作之劳累深有感受。“当时总编室主任、编辑共4人，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。在这段时间，我每天工作达15个小时，一年四季从没休息过，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印刷厂。忙报纸编辑出版，忙报纸零售，忙跑印刷厂看清样签字付印，至夜间11点方可休息。”

早晨5点起床，办理零售报纸业务比较方便。宁本君住在办公室楼上，又在总编室工作，这项工作做好了也不容易。那时《潍坊日报》是4开4版小报，每张定价2分钱，卖给报贩每张1分5厘，他零售每张挣5厘。别看利钱小，一人一天卖500份报纸，一个月下来能挣75元，相当于当时两个工人的月薪，有的报贩一天卖1000份报纸，一个月能挣150元，相当于当时两个科级干部的工资。因此报贩人数一天比一天多，比较固定的报贩就有15人。他们一般每人一期订500份，多者一期订800份到1000份。报纸全部期发行量不足4万份，光在潍城区零售一期就突破1万份。1985年夏，有一期报纸零售份数达10500份，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。

一张创刊不久的4开小报，为什么如此受欢迎？宁本君说：“主要是当时全市就我们一家地方报纸，并登有电视节目，报纸价低。”就报社来说，零售报纸也没什么亏吃，按邮发政策，每张报纸2分，邮局提取5厘，报社每张报纸实收1分5厘，零售报纸报社既不减少收入，又扩大报纸影响和发行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，宁本君甘愿受累，承担了这项工作，每期报早5点前，由司机送总编室，他早起到总编室分报纸，按头天各报贩订的份数，逐一分好、封好，写上订报人的姓名和份数，这一任务约一小时完成。报贩不等报社开大门，老早赶到报社取报。宁本君在文章中称：“回首报社初创之艰辛，再看40年来报社巨大变化，旧貌换新颜，我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。”

资金短缺车辆不足 自掏腰包招待客人

宁本君回忆，报社创办时，市政府批给30万元开办费，装修旧办公楼，置办办公桌椅等，所剩无几，只花1.6万元购进一辆帆布篷北京吉普车，外单位赞助给了一辆即将报废的旧面包车，不久又买了辆新“130”货车，两年多报社就只有这三辆车，运转不过来，就向外单位借用。车少又差，很难满足一个新闻单位的工作需要。

创建之初，员工宿舍楼的购置也颇为波折。宁本君称，1986年，报社买30户商品房宿舍楼，本来是4个单元40户，在动工之前曾有签约，这幢宿舍楼建成，由报社买下。可在建成后交付使用时，报社连买3个单元的钱都不够，只交了

两个半单元零两户的钱，即27户。不交钱，人家房建单位不给钥匙。27户搬进新宿舍过了几个月，才交上另3户的钱，总算买下了3个完整的单元30户。另一个单元10户，实在没有财力。

报社创刊初期，因资金困难，就连日常接待小小开支也无处下账。“我当时在总编室负责，总编和主持编务工作的副总编，两人都不会抽烟，他们知道我抽烟，来了客人就向我要烟待客。1985年春节前，当时的诸城县委宣传部领导等3位同志来报社慰问看望，总编让我安排在市招待所就餐，我和报社总编等4人，自掏钱带酒，招待了客人。”宁本君回忆说。